

内幕·1970

触目惊心



黄河出版社

内幕·1970

触目惊心

杨剑鸣 著

黄河出版社

内幕·1970

触目惊心

杨剑鸣 著

黄河出版社出版

青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9

1997年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5054-0318-4/G.0071

定价:14.80元

出版说明

提起“文化大革命”，相信人们都不会忘记。尤其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对“十年动乱”的往事更会记忆犹新。我本人有幸成为最后一届红卫兵，佩带过红色的袖章。由此而使自己成为一位历史见证人，虽然经历不够完整，但是也勉强可以对当时的事件发表一孔之见。

关于“文革”，年轻人感到陌生，听了父辈们胆战心惊的回忆，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并且发问：“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在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还会产生这种灾难呢？”事实上，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那种浩劫的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人们但愿这是一场梦，但它却是一场恶梦，留给世人深刻的精神创伤。

“文革”是一场民族灾难，它的产生背景是十分复杂的，有封建官僚政治的作用，有个人迷信的影响，有宣传工具的误导，还有广大群众的愚昧和善良。

“文革”的经历是一场闹剧，是一种荒唐和心酸。其中的许多经历是令人发指和令人不寒而栗的。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摆脱了这种愚昧状态，再也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了。然而，痛定思痛，为防微杜渐和告诫后人起见，还是应当总结这段历史的教训才对。

“文革”研究一度成为无人敢问津的禁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范围放宽，各种“文革”研究著作应运而生。其中有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消遣性的文艺作品。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可喜现象。为了帮助广大读者回忆和了解“文革”历史，我们精

心汇成此书。虽然它难登大雅之堂,但却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牢记“文革”历史的知识读物。相信您读后会捧腹大笑,无可奈何地苦笑,或者感到哭笑不得,甚至触景生情地流泪……。倘若这些小笑话在令您发笑之余,尚能给您一些人生启迪,那就完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

愿善良的人们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

编 者

1993 年于北京

目 录

革命造反篇	(1)
文化教育篇	(71)
红卫兵篇	(125)
知识青年篇	(141)
诗词歌曲篇	(172)
其它	(188)

革命造反篇

1. 蜗牛事件

为了发展中国的彩电工业，1973年，四机部准备从国外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派代表团去美国考察，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代表团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礼品。蜗牛在美国象征幸福、吉祥。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四机部一个很“敏感”的人就此事打小报告给江青。江青闻言后，一口咬定美国人是别有用心地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责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由于此事影响，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工作被推迟了几年。

2. 最、最、最

“最”本是副词，通常不能重复使用。但是在“文革”中，由于林彪的提倡，这个表示最高级的词汇无限制地堆砌，成为那个狂热年代的文风标志之一。

林彪说：“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于是马上有人效仿起来。“最最最热烈地欢呼”，“最最最衷心地祝愿”，“最最最……”等流行起来。似乎最字使用的多少成了表示革命性强不强的标志。

当时，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语言中，“最”字的运用更是连篇累牍。如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的开头写道：“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

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30 个字用了 7 个“最”字。令人看来简直太荒唐可笑了，而当时却被一本正经地、狂热地运用。

3. 最高指示

林彪创造的名词，特指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个指示。林彪别有用心地讲：“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一般的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当时，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无论黑天白日，都要立即上街欢呼游行。

4. 摸鸡笼子

1973 年，农村掀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狂潮。湖北省某县一个大队，家家户户都养几只鸡解决零用钱。全村共养了近 4 千只。上级认为他们是“为资本主义供氧输血”，是“留恋小生产”，下令社员“割尾巴”。社员们想不通，上级就派出一支“割尾巴”工作队，半夜三更摸进村去掏鸡笼子，把鸡杀掉，结果闹得鸡犬不宁。

5. 效忠信

“文革”时期，林彪、江青集团成员，为了表示对主子感恩戴德，竭诚尽忠而写效忠信。如 1968 年以后，江腾蛟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 20 多封信，表示：“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这是我和我们全家永生不忘的大恩，没有别的，

只有一条誓言，不管任何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不会说出一个难字。”这个 50 多岁的人还在写给 20 来岁的林立果的信中说：“苦思数日，想不出在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出我的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我能不以实际行动报答吗？！！”

吴法宪也在写给林彪的信中表示：“天变、地变、宇宙变、红心永不变。永生永世、子孙万代都要做林副主席的忠诚战士。”

这些人卑躬屈膝到了连一点人格都不要的地步！

6. 赶社会主义大集

1974 年底，毛远新到辽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视察”。他认为该社“资本主义的东西相当多，看不出人民公社优越性”。于是，发起所谓“赶社会主义大集”活动，1975 年 1 月 5 日，按照预先的布置，由广播宣传车开路，公社书记带头，让社员携带各种农副产品，敲锣打鼓，又唱又跳地去到供销社交售。毛远新自鸣得意地吹嘘这是解决农村走姓社还是姓资道路的问题的好办法，强令在全省推广。

7. 战斗小分队

“文革”中，某民航局成立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1 年 3 月，林立果称赞他们：“啊！我的一支小分队。”于是，宣传队就改名为“战斗小分队”了。

该队有严格的“纪律”，强调对林彪一家的忠诚感情。他们的誓词中说：“我们在战斗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

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结果，随着林彪集团的倾覆，这支战斗小分队也土崩瓦解。

8. 如此“现行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本意是指有现实的反革命罪行的人，当时却成了造反派随便整人的借口。现举两例如下：

南京浦镇有一装卸工，有一次闲聊时说：“毛主席满面红光，林彪骨瘦如柴。”结果被人汇报上去，被判刑 5 年。

南京铁路建筑队某工人，在一座土窑西侧干活。当时正刮东风，窑里冒烟弄得他满身烟灰。他对一起的人说：“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结果被人汇报上去，被认为是和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调”，被判管制 3 年。

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在《党史探索》中谈了自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经过：“我对‘文革’有怀疑，仿佛感到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有些错误，感到‘文革’搞得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矛盾的。对于这些我想不通，因此写到日记里去了。不久，这篇笔记抄家时被发现了，我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这种因一句话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不胜枚举。

9. 批“黑画”

1974 年初，“四人帮”指使文化部的亲信，从全国十几个省市收集了 700 多幅绘画作品，从中挑选出 200 余幅，在北京举办了一次“黑画展”，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批判会开得荒唐之极。如有一幅画了一只大公鸡和迎春花的花

鸟画，姚文元批判它“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四人帮”的党羽立刻附和道：“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寄托了一小撮复辟狂的阴谋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10. 张春桥歪诗

1976年2月中共中央发了一个一号文件，宣布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咬牙切齿地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的诗文：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

列位请看，这首诗不正是张春桥对自己的鞭挞吗？！

11. 《三上桃峰》事件

1974年初，文化部决定在北京举办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山西省选拔了晋剧《三上桃峰》参赛。此剧赞扬一位主人公给因为买了病马而蒙受损失的桃峰大队送去一匹马，以支援春

耕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料，此剧被“四人帮”打成“文艺黑线回潮”的黑典型，而且别有用心地与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联系在一起。认为此剧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王光美歌功颂德。”由此形成打倒“回潮派”、“复辟派”、“翻案派”的狂澜。

结果是冤案迭出，谈“马”色变。某出版社的一本《大红马》画册被停印。湖北的一部儿童剧《桃山新苗》，因为沾了一个“桃”字而被停演。

12. 三突出，三陪衬

这是号称“文艺旗手”的江青创造的唯心主义、行而上学的文艺创作模式。三突出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由此，当时中国的电影和剧作中形成一种政治上的“高、大、全”，生活上光棍一条的固定模式。

“四人帮”将“三突出”誉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作为补充，又提出了所谓“三陪衬”原则：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反面人物要反衬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之中，一般人物要烘托、陪衬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人物要烘托、陪衬主要英雄人物。这种虚假和公式化的模式，形成人物形象千人一面，人物关系千篇一律的呆板现象。

13. 三十字方针

林彪鼓吹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全国人民以这个方针为指导，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几乎天天都要开“学毛著会”和“讲用会”。

14. 大树特树

1967年，林彪提出的制造个人迷信的新词汇。《人民日报》当时就发表过标题“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

15. “万岁”泛滥

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提倡下，不但“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响彻全国，而且由此演化为各种仪式，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万寿无疆”歌等。毛主席提倡的各种“新生事物”也均以“万岁”称之。如“文化大革命万岁”，“一月风暴万岁”等。

当时有一首歌曲叫《万岁，毛主席》，全曲共三段，每段唱8个“万岁”和一个“万万岁”，一共是24个“万岁”和3个“万万岁”。

16. 江青替人改名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有一次，她去小靳庄，问一位女社员叫什么名字，社员回答：“周福兰”。江青听后，强迫她改名为“周克周”，意为“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

17. 请人种地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把天津宝坻县的小靳庄树立为“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让村里的农民写诗，大唱样板戏。全村200多个劳动力，经常有五、六十人常年脱产

写诗，唱样板戏。因此必须调动解放军和机关干部去“大力支援”生产。时人戏称为“社员唱戏，请人种地”。

18. 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句话最早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人邓宝珊讲的。后来被毛泽东采用。“文革”中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造反派将其推向极端。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从而形成了人整人，人斗人，人批人的局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成为阶级关系。“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闹得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全国人民都陷进“阶级斗争”泥坑里。

19. 马振扶中学案

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初二学生张玉勤英语考试成绩不好，她在考卷后面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结果，她受到学校批评，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1974年1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就这件事大做文章，把学校的负责人和班主任各判刑2年，揪斗280余人。

20. 三忠于四无限

“文革”时表现个人迷信的口号。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

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当时“忠”是“最大的政治”。人们每天都要表“忠心”，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做语录操。家家户户像供神一样供奉小塑像，单位建造数层楼高的大型塑像，上班时在单位拜，下班后在家里拜，拜的次数越多，越显得“忠”。“英雄人物”牺牲前必喊“毛主席万岁”；抢险救灾，人都淹死了，手中还紧握着《毛主席语录》。某个社员家中失火，他不救东西，首先拿起“语录本”往外冲，结果报纸夸奖他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握“语录”的动作是：手握红宝书，先贴着心窝，然后挥向头顶前；大拇指紧贴封面，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贴紧封底——此举表示“三忠于”；小指顶住书的下沿——此举表示“四无限”。

21. 天天读

这是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形式主义规定。

林彪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天天用。”其具体要求是：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而且是“雷打不动”，一切让路，不得迟到早退，或者擅自改动。方式是有时指定集体学习，挑选一个人高声念，大家听；有时个人自学，但必须集中在一起，以免“放任自流”。要记笔记，写心得体会。

22. 宁要……不要

“四人帮”在“批邓”中提出的一种口号。1975年，张春桥说：“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其他人也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今天看来，这些话何其荒谬！

23. 左右为难

某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关入“牛棚”批斗。

第一次批斗会后，他按往常习惯打了两三饭。担任看守职务的造反派忿忿地斥责：“揪斗了你，还要吃三两，简直满不在乎，没有触及灵魂！”

第二天又斗，这位干部改吃二两，造反派又横眉怒目：“好嘛，吃二两，想减食来消极抗拒，态度恶劣！”

第三天再斗，干部只好吃四两了，造反派怒不可遏：“斗了你，还多吃，你安心留本钱秋后算帐，真是死不改悔！”

24. “中国(马列)共产党”事件

1968年8月，陈伯达和谢富治指使爪牙，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刑讯逼供、诱供，交代“反党集团”后台。因被逼无奈，被迫胡诌出朱德等几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名字。审讯人员大喜，急忙追问：“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周不知所答。审讯人员赶快提醒他：“你们这批反革命分子是钻到党里面来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是党内的小集团。”于是，周按着审讯人员的引路，坦白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审讯人员如获至宝，赶紧向主子汇报。

林彪、“四人帮”趁机诬陷这个所谓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要搞政变,无中生有的捏造朱德是“伪党中央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1967年6月该党曾秘密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通过陈再道,首先夺取武汉,而且发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这些“左派”们煞费苦心编造了半天谎言,最后自己也觉得情节过于荒诞、离奇,而不敢向毛主席呈送。

25. 赵健民特务案

1968年1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康生对敢于对“文革”提出意见的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进行审讯,污蔑他是“叛徒”,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特务”。结果,赵健民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云南省1400余名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下面是当时审讯时的两段对话:

康: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1936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